海康威视：在创业热土上不懈耕耘

■ 李 洁/文

2020年是杭州高新区成立30周年，30年，换了新颜，如今的高新区正朝打造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奋进。2020年也是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康威视）成立的第20个年头，20年间，海康威视从创业伊始的28人到如今超过四万名员工，从压缩板卡起家到成长为业务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

2001年，海康威视诞生于杭州马塍路；2011年，海康威视搬迁至滨江东流路；2018年，位于阡陌路的海康威视总部（含东区、西区）正式投入使用……伴着杭州高新区改革开放、乘风破浪的前进脚步，海康威视牢牢把握自身优势和行业机会，实现了快速增长。

●海康威视外景

▲扎根杭州高新区

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企业，海康威视在杭州高新区（滨江）循序渐进地扩展版图，将根深深地扎在了这里。诚信、务实，这是海康威视和杭州高新区（滨江）共同的特质。

多年来，从技术创新、人才生态、产业发展，到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等多方面，杭州高新区（滨江）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上做出了全方位努力和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市场机制，持续推进创新创业，并为海康威视的发展提供了贴心的服务。

在初创期政府会给予企业更多关爱和指导。一旦企业上了轨道，政府就很少打扰，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然生长，这是杭州高新区（滨江）的务实之处，滨江企业更多的是遵循市场规律自然生长。杭州高新区（滨江）在不偏不倚的政策之下，将创新创业做成水到渠成的事，自然孕育出好的产业环境。这恰恰也是海康威视需要的创业氛围。

目前，杭州高新区（滨江）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生命大健康等前沿技术领域诞生了一批国内乃至世界级领军企业，形成了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

▲抓住历史机遇，实现迸发

2001年，视频监控正处于由模拟向数字转型中，当时国内市场主要被外资品牌占有，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旗下中电52所将核心业务瞄准了视频监控，在长期探索企业化运作的基础上，由彼时在中电52所已经干了15年的胡扬忠牵头，带领开发二部的27位同事以创业者的心态组建了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从研发、生产数字监控产品压缩板卡起步。2003年将H.264算法引入视频监控领域，推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DS-4000H视音频压缩卡。2004年年中，从公司发展长远布局考虑，海康威视自建销售渠道，开启了安防行业全新的市场布局。2007年，公司推出首款摄像机产品。2010年5月，海康威视在深圳中小板上市，募集资金34亿元，这使得海康威视的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和健康，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2011年，海康威视跃居全球视频监控市占率第一位，也在同年，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海康威视将总部迁到了滨江东流路。上市、搬迁、市场机会等带给了海康威视新一轮增长，自2010年上市以来至2019年，海康威视营收复合增长率达到36%。2019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为576.58亿元，是2010年的36.05亿营收的16倍。

几年间，海康威视抓住行业的智能化浪潮，2016年海康威视推出全系列深度智能产品，2017年发布AI Cloud架构，2018年发布物信融合数据平台……目前海康威视将业务聚焦在了综合安防、大数据服务和智慧业务。

进入2020年，海康威视提出打造智慧城市“数智底座”，将多年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积累融汇为对智慧行业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统一技术底座。

▲海康威视的天时、地利、人和

根据Omdia报告，海康威视已经八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连续四年蝉联《安全与自动化》“全球安防50强”榜单第一位。海康威视能够成为行业领跑者，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

一是天时。海康威视牢牢抓住了技术和市场双重成熟的时机。公司起步于视频监控技术的范式转变，也就是模拟视频监控向数字视频监控的转化期。这是技术上的机会。同时市场方面也有很强的拉动。“9·11”事件后，国际上对视频监控行业正式放开，加上中国当时正在推行“平安中国”建设，这使得国内、国际两大市场成为持续存在的市场。随后，视频监控技术又陆续经历了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阶段，每一次的技术发展，都进一步打开了市场空间，为公司持续发展创造了机会。

二是地利。公司诞生于杭州。海康全球总部所在的杭州高新区（滨江）是一座创新活力之城，优美宜居的自然环境、良好的创业氛围、全国领先的人才政策、周到便捷的政府服务，培育了大量优秀企业。海康威视2001年成立至今，杭州高新区（滨江）的领导一届届更换，但对于创新的支持从未改变。

三是人和。海康威视的28人创业团队绝大多数是工程师出身，整体素质较高，对“专业、厚实、诚信”的经营理念高度认同，又善于学习，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来自技术、市场、管理方面的挑战。

经过30年的发展，今天的杭州高新区（滨江）具有产业结构优、创新能力强、人才吸引力大、体制机制灵活、工作居住环境优越等诸多优势，这里聚集了众多的优秀上市公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业之城、数字经济高地。

作为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海康威视将努力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发挥优势，赋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为做大做强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杭州高新区（滨江）数字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供图/海康威视）

读懂深圳奇迹，照亮中国未来

▶▶▶[紧接A1]

为自己的体制很优越了，就会导致改革动力的弱化，这就叫“观念的深水区”。

第二，利益问题。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了，政府的审批权和审批权背后的价值太高了。这个既得利益可能大到无法想像。陕西秦岭别墅事件，中央批示了6次，中纪委副书记两赴西安督阵才把这个事情搞定。这就叫“利益的深水区”。

▲增长模式的抉择

我刚才讲到了后发劣势，中国要想把未来的改革开放深入下去，我觉得必须从观念上认清楚目前的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目前的模式我把它归纳成为三要素：市场经济、投资驱动、强势政府。

市场经济当然是对的。但投资驱动是很有危险的，中国的投资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一个例子，2009年到2012年4年时间，中国用掉的水泥的数量就超过了美国20世纪100年用掉的水泥数量。可是靠投资驱动最终会带来金融危机，因为很多投资到了一定阶段，投资回报率下降这是规律。为什么企业家都抱怨实体经济赚钱越来越难？因为投资过剩、产能过剩，怎么赚钱？

第三是强势政府。这一点即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也是过去40年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解释。印度现在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5。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历史，你会大吃一惊。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GDP（156美元）比印度（205美元）还低，直到1991年中国才第一次超越印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龙象渐行渐远。

与印度相比，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效率，都离不开强势政府体制的支撑。高铁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中国高铁能够如此成功，与政府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如今，中国已经过了“赶超阶段”，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靠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是以任正非为代表的企业家，不是官员。

所以中国未来要转型，就是必须把投资驱动改成创新驱动，把强势政府改成法治政府。要走向创新之路，我觉得大政府和创新是不兼容的。一个什么都要审批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创新的国家的。

▲观念决定行动

当然，中国经济前行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尤其是如今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刘鹤副总理写过一篇文章，他对发达国家犯的错误做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总是要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是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扩张的时候采取了紧缩；应当采取开放的时候，采取了保护主义；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出现了倒退，全都做反了。这些明显的错误事后看来很可笑，可是对当时来说实施政府的政策却困难重重，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座大山，结果就被民意所绑架。

以特朗普崛起为标志，我们在今天看到俄罗斯、土耳其、菲律宾、巴西、墨西哥，都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了民粹主义化的趋势。比如特朗普的很多政策都是很可笑的，但是，特朗普为什么能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民意基础，有很多美国的底层民众。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40%的选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这些人特别喜欢特朗普，所以是有民意基础的，在民意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采用了很多短视的、不负责任的政策，这种势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90岁的吴敬琏先生在2018年出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当中写到：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改革的深水区，我们非常需要深圳改革开放的2.0版本，渴望深圳精神的延续。

▲改革的复杂性

我们也要承认改革的复杂性，任何改革都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温良恭俭让”，改革过程其实是非常复杂、很危险的。

福山是《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的作者，柏林墙倒塌后，福山一夜成名，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最近又写了几本书，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反思，他认为现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良序，就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更让世界见证了“灯塔的倒掉”，令福山大跌眼镜。

如今的福山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秩序。但要实现良好的秩序并不容易，需要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第一大支柱是一定要有政府，没有政府天下大乱。第二大支柱，一定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政府就会变成猛兽管不住了。但是有政府和民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还不行，如果只是政府和民主两者结合起来很容易出现民粹主义。所以社会需要法治。这是我们对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理解。我们要建立民主、法制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改革操之过急。亨廷顿是福山的博士生导师。亨廷顿在60年代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争论，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出版之前，美国人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学习美国的民主，然后经济就腾飞了，先民主再腾飞这是美国的逻辑。但亨廷顿却说：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能谈得上限制权威，如果社会动员超过政治机构发展，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看看拉美、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现状，你不能不同意，历史已经证明亨廷顿是对的。

▲落实改革需要“激励兼容”

我们知道，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改革的执行，恐怕都离不开官员的配合。这一点，也是王安石和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沉重教训。

我们今天面临着类似的历史考验，中央已经多次警告官员的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形式主义、低级红、高级黑。在实践中表现为：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一刀切等等现象。

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激励不兼容。实现“激励兼容”，应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要落地第一条就应该改变官员的KPI，也就是考核激励机制，也就是业绩指标。官员过去的业绩指标是什么？是GDP。不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恐怕困难重重。在解决官员激励问题上，新加坡的经验（一次性特赦+精干的公务员队伍+高薪养廉+提高违法成本）尤为值得借鉴。

（作者系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70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2014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著有《下一个十年》等）